

党史资料通讯

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 编

1987

10

《党史资料通讯》1988年度征订启事

《党史资料通讯》是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主办的刊物，其宗旨是：指导工作、反映成果、介绍情况、交流经验、提供信息，以推动和促进全国党史资料征集、整理、编研工作的健康开展，为两个文明建设服务，为贯彻落实党的路线的两个基本点服务。

《党史资料通讯》内容主要有三个方面：（一）关于指导工作的文件、报告、有关领导的讲话和指示等；（二）关于反映党史资料征集整理工作的成果；（三）关于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工作情况、动态、经验和信息等。

本刊辟有“重要文章”、“文献档案”、“研究与探讨”、“本刊专访”、“征集工作”、“经验交流”、“回忆录”、“党史人物”、“史实考证”、“专题资料”、“史料文摘”、“史迹巡礼”、“外论介绍”、“业务学习”等20多个专栏。

《党史资料通讯》的征订范围为：各级党史资料征集研究机构（包括军队系统）、各大专院校、各大企事业单位，各革命博物馆、纪念馆、档案馆和图书馆，各干休所及老干部，广大党史、革命史教学与研究人员和宣传理论工作者等。

收费办法：《党史资料通讯》为月刊，每月20日出版，全年定价6.60元（含邮费）。订阅份数在20份以上者（包括20份）汇款时加交挂号费1.50元；不满20份一律平寄。

收订截止日期：1987年11月底（请尽快办理）。**收款户名：**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开户银行：**工商银行北京海淀分理处。**帐号：**8901—451。**通讯处：**北京一九二九信箱。**地址：**颐和园东侧中央党校南院内。**电话：**203,2974。

本刊登记证号：国内统一刊号CN 11—1500。

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出版发行处

1987年9月30日

党史资料通讯（月刊）

一九八七年第十期
（总第三十八期）

编辑：《党史资料通讯》编辑部
（北京一九二九信箱）

出版发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北京一九二九信箱）

印刷：北京昌平百善印刷厂

国内统一刊号：CN11—1500 本期十月二十日出版

目 录

宋平同志对组织史资料编纂工作的意见	(1)
-------------------------	-------

【专题资料】

二月抗争纪实

——“二月逆流”的历史真相	谭宗级 (3)
---------------------	-----------

【研究与探讨】

论毛泽东上井冈山的认识过程 (下)	王健英 (15)
---------------------------	------------

【综述】

关于蔡和森研究的若干问题	韩泰华 (18)
建国以来党对社会主义社会发展阶段的认识	张占斌 (24)

【史实考证】

李大钊在日本接触社会主义思想考	杨树升 (29)
-----------------------	------------

【业务讲座】

中共党史资料征集工作历史概述 (之四)	费云东 (32)
-----------------------------	------------

【译文选登】

季米特洛夫关于中国革命的两个文件	马贵凡译 (36)
------------------------	-------------

【史迹巡礼】

井冈山革命遗址介绍 (下)	王慧中 (40)
-----------------------	------------

【书评】

雄伟历史画卷的袖珍缩影——评《湖南党史大事年表》	唐伯固 (44)
--------------------------------	------------

【国外书刊介绍】

日本近年来出版的几本中国近现代史	程慎元 (46)
------------------------	------------

【信息窗】

文物征集 (47)	会议消息 (47)	学史建碑 (48)	地方书讯 (48)
-------------	-------------	-------------	-------------

宋平同志对组织史资料 编纂工作的意见

中央组织部部长宋平同志最近听取了李锐、王雨亭、李冰、陆沅同志关于组织史资料编纂工作的汇报，提出重要意见如下：

一、关于中共组织史资料编纂工作，不存在干不干的问题。这项工作中央并没有说要停，不能半途而废。《人民日报》2月28日那篇评论员文章我看了，指出编史修志不要外调人员满天飞，不要借机旅游，要注意节约。

各省、区、市，多数县都正在编写。老同志对这项工作积极性很高，很可贵。

二、个别省、自治区要不要编文献？有特殊性的，如边远省、区以及少数民族地区的可以编。

三、组织史资料是编写组织史的基础，没有这些资料，写不出组织史来。

编写组织史，要有政治背景。否则，党怎么产生的，从天而降吗？不写政治背景，不知道为什么产生了党。组织史资料不能编成单纯的人名录，象本人名字典。有的县编了这么一大本人名录，客观是客观了，但看不出问题来。浙江仙居县编的还有点历史背景材料，能看出背景来。政治背景如何取舍？你们要找中共党史草稿来研究，革命前期的情况，老同志熟悉，可多向老同志请教。可以研究几个问题，例如：如何分期问题，组织路线同政治路线的关系等。组织工作是为政治路线服务的，组织机构的变动是根据政治形势和政治任务确定的，组织活动、组织机构的变动要联系政治背景，要说明历史背景，不然看不清楚问题。政治历史问题的结论以中央有关决定为依据，编纂中不可能没有观点，当然力求其附合历史真实，力求正确。

四、征集资料过程中，要把一系列副产品，如历次肃反事件等，整理成专题资料，这是很宝贵的。有的材料丢掉就再也找不到了，如不抓紧，就会湮没，如杨度^{〔注〕}是党员，谁能料到？对提供材料人的身份、政治面貌，也都要注明，搞清楚。这往往同材料的真伪、可靠不可靠有关。

要注意征集、整理专题材料。例如审干问题、知识分子问题，等等。审干搞了许多次。党的历史上有一段强调工人成份，张国焘自己是个大知识分子，却非常反对知识分子，搞唯成份论，在四方面军就错杀过知识分子。从历史上看，我党对待知识分子是有教训的，在严酷的斗争中，把知识分子同革命动摇性联系起来。

战争年代档案材料不全。当时文字工作不可能很完备，中央组织部那时恐怕也没保存正式会议记录。回忆录中阴差阳错的东西也恐怕不少。

写回忆录，文献资料很重要很宝贵，有档案记录的，比较可靠；没有资料，许多事记不清了，回忆录就很难写，有些事情时间短的还可以，时间长了就很难保证它的准确性。敌伪档案中可能有些材料；同时，现在我们还有“活资料”，包括有些脱党的人，要抓紧收录。

〔注〕 杨度，湖南湘潭人。曾留学日本。原主张实行君主立宪制。1914年袁世凯解散国会后任参政会参政。1915年联络孙毓筠、严复等组成筹安会，策划恢复帝制。后倾心革命。1927年李大钊被军阀张作霖逮捕后，曾多方营救。1929年秋加入中国共产党，在白色恐怖下坚持为党工作。1931年病逝。

海外这方面的材料也可收集。

五、整理编写党的组织工作大事记，你们要抓紧找老同志访问。你们可以列出两个需要访问的名单，其中一个是需要访问的中央负责同志名单，要包括过去中央的、地方的、苏区的、白区的。白区的情况，有许多同志还在，他们各了解一些情况。找这部分同志之前，搞个简要的提纲，提出问题，帮助他们回忆，他们谈的内容要录下音来。这项工作你们要抓紧，争取一两年内搞出来。除了需要访问的中央负责同志名单以外，另外再搞个其它需要访问的名单，分分层次，名单范围多大，请你们定。革命早期的事情，争取早一点弄清楚。

团的历史同党的历史关系很密切，革命早期团的作用不能忽视。这方面的材料，可请定一同志看看，或念给他听听。总之，要接受有的材料没有全部“抢”下来的教训，抓紧一点，否则将是无可补救的损失。

易礼容同志身体怎样？关于工会的事还可问问他。地下党的资料保留的少，有些情况很不容易搞清楚。

六、你们要研究一下指导思想以及编写的纲目，先把这个弄清楚，作好准备。指导思想明确了，有了纲目，剩下的就是怎样组织人力了。

有些老同志身体还可以，又熟悉党史，你们可以同他们商量，请他们参加。北京老同志很多嘛！党校有没有力量？党校有党史教研室、党建教研室，还有人民大学、解放军政治学院等，要挑一批熟悉党史的同志，借调来参加这项工作，他们是愿意干的。编辑组要先充分利用北京的力量。

搞这项工作需要有个地方。现在没有多少人，可以分头看材料。下一步人集中起来就需要找个写材料、开会讨论的地方。

调查问题，现在县一级实际上也在跑材料，我家乡那个县（山东莒县）已来京好多趟了，他们调查得很细，县委也重视。应尽量多搞函调，派人外出调查要有控制，只能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

必要的经费需要解决，不宜作统一规定，可由各地同主管方面商定。

这件工作要靠你们搞，就靠你们这个班子。你们研究了编纂框架，研究了一些政策问题，做了不少工作。请李锐同志把这件事领导好，抓到底。

《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征购启事

由中共湖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组织编纂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之一），最近已由湖南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

该书系在对大量史料进行认真的筛选、鉴别、核实、考证的基础上编纂而成。全书包括综述、文献资料、回忆资料、参考资料、大事记、考证文章、部队来源及组织系列、图表、照片及研究资料索引等。书中所收中央及湖南省委文件，大部分为首次发表，具有较大史料价值。

全书20万字，书价2.60元。现湖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尚有部分存书，可以邮购，欲购者请从速联系。

二 月 抗 争 纪 实

——“二月逆流”的历史真相

~~~~~谭宗级~~~~~

“文化大革命”不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而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所利用，给党、国家和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内乱。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利用我们党和毛泽东所犯的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并把它推向极端，大肆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妄图摧垮我们的党，毁灭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但是，林彪、“四人帮”篡党窃国的罪恶阴谋终于不能得逞，这是由于我们广大的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在十年动乱中进行了英勇顽强、不屈不挠的斗争。可以说，林彪、“四人帮”在十年动乱中肆虐横行的过程，也就是我们党和人民同他们作斗争的过程。首先起来抵制“文化大革命”，同林彪、江青一伙的倒行逆施作坚决斗争的就是我们党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其中一次捍卫党的原则的伟大斗争发生在1967年2月，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一伙把它诬蔑为复辟资本主义的“二月逆流”。为了拨乱反正，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学习老一辈革命家的革命精神和高贵品质，现将所谓“二月逆流”的历史真相概述于后。

### (一)

所谓“二月逆流”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事实真相怎样？林彪、江青之流秘而不宣，却一个劲地声讨、诬陷。1968年10月26日，林彪在八届十二中全会讲话中大放厥词，说：“二月逆流是八届十一中全会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反党事件，是刘邓路线的继续。二月逆流的矛头是直接指向毛主席，指向中央文革的，同时，也是指向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的。二月逆流的性质是反革命的，其目的是要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成绩，为刘、邓、陶这伙人翻案，还要否定延安整风，为王明翻案。”这真是危言耸听，妄加罪名。康生于1968年10月28日在八届十二中全会第四小组会上也说：“二月逆流的性质是严重的，是资本主义复辟的预演，是和平演变的预演。”他竟然丧心病狂地把这一事件比作“赫鲁晓夫的宫廷政变”！充分表现了这位“理论家”“罗织学”的水平。林彪反革命集团的主犯邱会作还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受害者”，在军队系统作了题为“关于二月逆流问题”的专题报告，大肆造谣诬蔑。不仅如此，他们还把这些不实之词写进党的文件。如在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中就有这样一段话：“全会严肃地批判了那个反对八届十一中全会决定、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对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一九六七年的二月逆流。”同样，林彪作的九大报告也说：“这股逆流，矛头对着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它的总纲领就是一条：推翻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决议，替已经被打倒的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翻案，替已经被广大群众批判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翻案，对于革命群众运动进行镇压和报复。”如上所述，林彪、江青、康生一伙给所谓“二月逆流”横加的罪

名是“反党事件”、“反革命事件”，罗织的罪状是“矛头三指向”、“三反对”。他们认为“谣言重复多次就会变成真理”，可以一手遮尽天下人的耳目。

经过20年岁月的流逝，这一历史事实的真相终于大白于天下。人们清楚地看到：所谓“二月逆流”事件，就是中国共产党内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就以他们高度锐敏的警觉性，及时识破了林彪、江青一伙篡党夺权的野心家，他们挺身而出，对林彪、陈伯达、江青、康生一伙的倒行逆施进行了一场英勇斗争。这场斗争是围绕着要不要党的领导、要不要保护老干部、要不要保持军队的稳定等这样一些关系到党和国家命运的重大问题展开的。林彪、江青一伙搞的所谓反击“二月逆流”，完全是颠倒黑白，蓄意诬陷，是为了打倒当时站在第一线反对他们的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这七位老帅和副总理，进而打倒周恩来、朱德，架空毛泽东，以达到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罪恶目的。

在“九·一三”事件后不久，毛泽东就已为“二月逆流”平反了，他多次指出：这件事搞清楚了，不要再讲“二月逆流”了。1971年11月14日，毛泽东接见参加成都地区座谈会的张国华、李大章等人，周恩来、叶剑英陪同接见。当叶剑英走进会场时，毛泽东对大家说：

“你们再不要讲他‘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他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力、关锋、戚本禹的。”1972年1月初，毛泽东对周恩来、叶剑英说：“二月逆流”经过时间的考验，根本没有这个事。不要再讲“二月逆流”了。他还说，现在我有事，请你们去向陈毅同志传达一下。接着，由叶剑英到医院向身患重病的陈毅作了传达。<sup>①</sup>毛泽东的上述讲话，说清了所谓“二月逆流”的真相。

1978年11月，中央工作会议再次郑重宣布为“二月逆流”平反，在这个案件中受到冤屈的所有同志一律平反。过去各种文件、材料中关于所谓“二月逆流”的不实之词，都应该作废。党中央的这一决定，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

经过拨乱反正，被颠倒了的历史终于再颠倒过来。为了如实反映历史的本来面目，我们必须摒弃“二月逆流”这一贬词，改称“二月抗争”、“二月正流”。正如陈云在1978年11月中央工作会议上所说：“一月是逆流，二月是正流”。1981年3月，邓小平在讨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也说：“所谓‘二月逆流’，不是逆流，是正流嘛，是同林彪、‘四人帮’的反复斗争嘛。”<sup>②</sup>这样，才能够真正表明抵制“文化大革命”的历史事实。总之，所谓“二月逆流”，实际上，就是中国共产党老一辈革命家抵制“文化大革命”，反对林彪、江青一伙的倒行逆施，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党的原则的重大斗争。

## (二)

这场重大的原则斗争发生在1967年2月，决不是偶然的。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和中央工作会议以后，从1966年下半年到1967年初，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一伙煽起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打倒一切”、“全面夺权”的妖风，党和国家面临着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

让我们回顾一下1966年底至1967年初那些惊心动魄的日子，看看当时尖锐复杂的斗争场面：

彭德怀刚恢复工作，调任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副主任，渴望在西南三线建设中为人民立新功，却被诬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大军阀”。戚本禹按照江青的旨意，指派北京

地质学院、北京航空学院的“造反派”于1966年12月27日把彭德怀从成都揪回北京，投入监狱，进行批斗。

1967年《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元旦社论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公开发出号召，提出1967年将是所谓“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将是所谓向“走资派”和“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的一年”。<sup>③</sup>果然随着1967年的到来，林彪、陈伯达、江青一伙煽起的“打倒一切”、“全面夺权”的反动逆流更加猖獗。在这股逆流冲击下，党中央、国务院许多部门以及全国各地许多党政机关瘫痪了，许多工厂、企业停工停产了，广大农村也动乱起来。“打、砸、抢”和武斗之风，象瘟疫一样流行蔓延开来。

1967年1月3日，邱会作操纵一些军事院校群众组织的头头，向陈毅、叶剑英发起进攻，扬言军队要在1月5日召开十万人大会，批判这两位老师。与此同时，出现了攻击聂荣臻和徐向前的标语、传单。

1967年1月4日，协助周恩来处理党和国家日常工作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央文革顾问、国务院副总理陶铸，被江青、陈伯达、康生采取突然袭击的手段打倒了。当天下午，中央文革小组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接见湖北群众组织“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兵团”，陈伯达、江青先后讲话，攻讦陶铸“到中央并没有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实际是刘邓路线的坚决执行者”，“背着党中央”“独断独行”，“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当晚传单传遍北京，这样就用突然袭击的手段，一下子把打倒陶铸的消息传出去了。当江青、陈伯达、康生接见湖北群众组织时，周恩来和陶铸等在人民大会堂另一个厅开会，并不知道他们在背后打了陶铸的黑枪。周恩来对江青、陈伯达一伙的卑劣行径极为愤慨。他在1月7日凌晨接见所谓“批陶联络站”代表时，郑重地向他们宣布：“陶铸是中央常委”，“你们举行批判陶铸的大会不恰当，因为中央常委对这个问题还没有讨论，你们开会我们不能参加！”1月23日夜，周恩来在接见首都大中学生代表时，又当着陈伯达、江青的面告诉群众：“陶铸是八届十一中全会选出来的，我没有根据不信任他呀！”<sup>⑤</sup>毛泽东看了打倒陶铸的传单很生气，一方面迫于既成事实，于1月8日成立由王力、唐平铸、胡痴组成的中央宣传组，以代替陶铸领导的中央宣传部；另一方面，于2月7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严厉地批评了陈伯达、江青。他批评陈伯达说：你是一个常委打倒另一个常委。过去你在我和刘少奇之间进行投机；不是你个人有事，你从来不找我。批评江青说：你眼里只有一个人，眼高手低，志大才疏。对林彪说：现在还跟过去一样，对我实行封锁。总理除外，总理有大事都是报告我的。对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说：只有陈伯达、江青两人讲了话，没有别人的事。马上叫张春桥、姚文元回京一趟，由文革小组开一次批评陈伯达、江青的会。后来因为发生了所谓“二月逆流”事件，陈伯达、江青不但没有向党中央和毛泽东写检查，反而摇身一变成为正确路线的代表了。

1月4日，江青又大闹中央政治局，恶毒攻击贺龙是“坏人”。“要把贺龙端出来”。关于贺龙被诬害的情况，薛明写有长文《向党和人民的报告》作了详细介绍，此处不赘述了。

1月7日至9日，林彪、江青一伙操纵几个坏人煽动受蒙蔽的群众，多次包围中南海，要揪李富春、陈毅、李先念、谭震林等老同志。

1月12日，戚本禹在江青的唆使下，向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的造反派头头诬蔑朱德“是老反毛主席的黑司令、大军阀”。于是在中南海、全国妇联和大街上贴出了“打倒朱德”的大标语。载有林彪辱骂朱德讲话的传单也在街上散发。所谓“揪朱联络站”还决定

2月10日在北京体育馆联合召开“斗朱大会”，被周恩来及时制止了。

天安门一带贴出外交学院刘令凯等人写的“打倒周恩来”的大字报，群众把刘令凯扭送到公安部。周恩来得知，坦然地说：“在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允许人民给总理贴大字报，不必抓他。”随即派人到公安部把刘令凯释放了。刘很感动，承认周总理具有无产阶级政治家的风度。早在1966年10月3日发表的由王力、关锋起草的《红旗》第13期社论《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中，就影射攻击周恩来“采取折中主义”。在《红旗》第14期为纪念鲁迅写的一篇社论中，关锋亲笔加上：“在阶级斗争的紧要关头，折中主义总是出来大喊大叫，或者唧唧嚅嚅，然而历史的命运注定了他们总是扮演一个可悲的角色”，以此来继续影射攻击周恩来。

1月8日，周恩来接见石油系统在京群众时说：“余秋里同志领导石油部以来成绩显著”，“在斗争会上给余秋里同志挂黑牌子，毛主席听到后不同意这样做”。1月12日，戚本禹接见国家计划委员会造反派时却说：“对余秋里的错误进行批判是完全必要的。在批判过程中，有些过头提法也是不可避免的。”叫嚣“如果有谁利用周总理讲话整革命群众，就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露骨地支持揪、打余秋里的逆流，公然和周恩来唱反调，对着干。

在林彪、江青的授意下，1月12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号召“向军内一小撮走资派和极少数坚持资反路线的顽固分子猛烈开火”，正式抛出“揪军内一小撮”的反动口号，妄图毁我长城。从此，人民解放军的领导机关、各大军区，从北到南，自东徂西，无不遭到冲击。

1967年1月6日，在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一伙操纵下，上海爆发了夺权逆流。这股逆流很快波及全国。1月14日，山西夺权。1月22日，青岛造反。25日，贵州响起所谓“西南的春雷”。31日，黑龙江放射出所谓“东北的新曙光”。与此同时，在江青的指使下，张本于1月12日夺了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的权。甚至毛泽东、周恩来严禁夺权的财政部也发动了夺权。

总之，1967年的早春，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打倒一切”、“全面夺权”的喧嚣声中，夺权与反夺权的生死大搏斗正在剧烈地展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新中国正面临着被一小撮阴谋家颠覆的严重危险。

### (三)

林彪、江青一伙的反革命阴谋活动，给人民带来深重灾难，不可避免地引起全国人民的强烈不满和各种方式的抵制和斗争。和毛泽东一起南征北战打天下的开国元勋们，更是忧心如焚，焦虑万状。“愿与人民同患难，誓拼热血固神州”。⑥陈毅、谭震林、李先念等到李富春（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业务组组长）的住处，询问陶铸突然被打倒是怎么回事？李富春也不清楚，回答说：“不知道，没有讨论”。老革命家们面对眼前的混乱情况，十分义愤地议论说：这些家伙把老干部打倒，把几个副总理和老师打倒，下一步就要打倒周总理，把毛主席架空，国家就要大乱。近半个世纪以来千百万人民大众、无数先烈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无产阶级江山怎能毁于一旦！这不能不引起老一辈革命家的高度警觉和忧虑。陈毅一针见血地指出：他们不光是反对几个副总理和几位老师，还要反对周总理，这一定是反革命要搞垮我们的党。他们这样搞，决没有好下场！老革命家们决心挺身而出，同林彪、江青一伙作坚决的斗争。

这场斗争首先是从军队问题展开的。在这个问题上，几位老师同林彪一伙存在着根本分歧。林彪、陈伯达、江青一伙为了达到乱中篡权的目的，千方百计地要把军队搞乱。几位老师认为，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担负着保卫祖国的神圣使命，一定要保持稳定。针对林彪一伙煽动群众搞乱军队的阴谋，1967年1月初中央发了文件，规定不准冲击军事机关。

林彪一伙并不死心，1月3日，林彪指使关锋、王力炮制《解放军报宣传要点》，抛出了“揪军内一小撮”的反动口号。林彪还提出了反对所谓“带枪的刘邓路线”。在他们的策划和煽动下，原来负责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贺龙遭到诬陷、抄家，许多同贺龙一道工作过的军队负责人被揪斗。

1967年1月在京西宾馆召开军委扩大的碰头会议。1月19日，陈伯达诬蔑军队领导干部（点名批肖华）是“绅士”，军队“资产阶级化”了。次日下午，康生、陈伯达、江青就指使人在会上攻击肖华，矛头对准几位老师。陈伯达、江青说：总政是“阎王殿”。半夜，抄了肖华的家。当时叶剑英拍案痛斥江青之流，在盛怒之下把右手掌骨震开了一条裂纹，造成第五掌骨远端骨折。<sup>⑦</sup>徐向前义愤填膺，一下子把杯子摔了。老师们刚正不阿，气壮山河。江青、陈伯达这伙阴谋家、野心家，邪不胜正，被老师们的义正词严吓得呆若木鸡，哑口无言。这就是所谓“大闹京西宾馆”。

为了顶住林彪、“四人帮”搞乱军队的阴谋，负责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副主席兼秘书长、中央书记处书记叶剑英主持召开了中央军委常委会议，讨论稳定军队的问题，向部队发出了搞正面教育、不搞“四大”的通知。不久，林彪利用掌握的权力，再次召开军委常委会议，蛮横地提出要部队全面搞“四大”。会上，陈毅、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四位老师坚决反对，严词质问林彪：军队搞乱了，天下大乱了，你国防部长靠什么？！两种意见相持不下。最后，陈、叶、聂、徐作了一点让步，决定野战部队不搞“四大”，军事院校可以搞“四大”，但不得串连。根据这个精神，拟出中央军委八条命令，送请毛泽东审定。毛泽东把陈、叶、徐、聂四帅请去，详细进行了研究，并作了批示：“所定八条，很好，照发。”1月28日发出的八条命令明确规定：“不允许用对待敌人的方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不允许无命令自由抓人，不允许任意抄家、封门，不允许体罚和变相体罚，例如，戴高帽、挂黑牌、游街、罚跪等等。”“认真提倡文斗，坚决反对武斗”。叶剑英说：有了尚方宝剑就好办了。这对林彪、江青一伙要搞乱军队的阴谋是个很大的打击。但是，他们反党乱军的反革命活动并没有因此而有所收敛。

1967年2月11日下午的政治局碰头会，象以往一样，由周恩来主持，参加会的有几位副总理和老师以及余秋里、谷牧；还有中央文革陈伯达一伙，壁垒分明，尖锐对立。

为党和国家命运感到无限焦虑的叶剑英首先起来讲话，他气愤地向坐在对面的陈伯达一伙，义正词严地说：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当场问得陈伯达张口结舌，支支吾吾，无言以对。这时，徐向前也拍着桌子，责问陈伯达：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你们这样把军队乱下去，还要不要这个支柱啦？难道我们这些人都不行啦？要蒯大富这类人来指挥军队吗？在这以前，徐向前曾因他们凭空捏造刘志坚是“叛徒”，顶过陈伯达。徐向前说：

“我们是带兵的人，军队的干部，跟我们打过仗，难道我们还不了解吗？”抗日战争中，刘志坚在冀南的一次战斗中受伤被俘，就在第二天，冀南军区得到地下情报，在敌军的行进路上

打伏击，解救了刘志坚。可是，林彪、陈伯达、江青一伙，为搞乱军队，捏造罪名，硬要把许多军队领导干部打倒，这怎么行呢？徐向前驳斥陈伯达说，刘志坚不是叛徒。正当徐向前述说这段战斗经历时，陈伯达不让徐向前说下去，蛮横地从中打断说，刘志坚叛徒的案已经定了，再不能改变了。

叶剑英又接着质问陈伯达、康生：上海夺权，改名为上海公社，这样大的问题，涉及国家体制，不经政治局讨论，就擅自改变名称，又是想干什么？叶剑英幽默地嘲讽号称“理论家”的陈伯达说：我们不看书，不看报，也不懂得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请你解释一下，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革命，能没有党的领导吗？能不要军队吗？聂荣臻说：你们把干部子弟和许多青少年说成是“联动”（即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成员，反动保守分子，进行打击迫害，纵容另一些不明真象的青年人批斗他们，有的还关押起来，这种“不教而诛”的做法是极其错误的！你们不能为了要打倒老子，就揪斗孩子，株连家属，残酷迫害老干部，搞落井下石，这就是不安好心！

这一场短兵相接的战斗，戳穿了林彪一伙篡党乱军的阴谋。围绕着这个焦点，双方一直进行着斗争。

过了两天，2月16日下午三时，在怀仁堂举行的当时主持党、政、军日常工作的负责人和中央文革成员的碰头会上，又进行了一场更加尖锐激烈的斗争。这就是后来被林彪、“四人帮”诬指为“二月逆流”的主要事件——所谓大闹怀仁堂事件。当天晚上，惯于“恶人先告状”的张春桥、王力、姚文元，为了诬告几位老帅和副总理，“集体整理和核对”了一个关于这次会议的“记录”。出于显而易见的目的，这份“记录”有许多歪曲、断章取义的地方。尽管如此，我们仍可从中了解这场斗争的梗概，看到老一辈革命家们在斗争中光明磊落、威武不屈的高尚品德。为了使大家了解这一事件的历史真相，不妨把这份“记录”作一如实介绍，并加一些必要的说明。

“记录”的标题是《二月十六日怀仁堂碰头会议》。其主要内容如下：

2月16日下午，周恩来同志主持的政治局常委碰头会，原订日程谈“抓革命，促生产”问题。

在开会前，当谭震林同志提出要张春桥保陈丕显，张说，我们回去同群众商量一下，谭震林同志打断了话，大发雷霆，说：什么群众，老是群众群众，还有党的领导哩！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搞革命。这是什么东西？这是形而上学！

你们的目的是要整掉老干部。你们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光。把老干部都打光。老干部一个一个被整，40年的革命，落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

“黑五类”有人讲话，高干子弟，怎么没人说话？高干子弟统统挨整，见高干子弟就揪，这不是反动血统论是什么？这是用反动的血统论来反对反动的血统论。这不是形而上学吗？

高干子弟一概打倒，弄得不敢出门。这是北京各学校的普遍现象。

现在的造反派，还不都是地、富、资本家的子弟！蒯大富是什么东西？就是个反革命！搞个百丑图。这些家伙，就是要将老干部统统打倒。

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

2月16日的斗争，确实是从谭震林保陈丕显的问题开始的。但是，“记录”笼统地说了

一句“谭震林提出要张春桥保陈丕显”，不仅把这一事实真相和双方辩论过程掩盖了，而且歪曲了谭震林同张春桥辩论的实质。当时，由于不少省委、市委书记被游街、批斗，毛泽东连续三次在三种不同的场合指示，要把一些省委、市委的主要负责人接到北京保护起来。周恩来排除多方阻拦，把一部分省委、市委书记接来北京。但是，仍有一部分同志在当地被无理扣押着，陈丕显就是其中的一个。因此，那天谭震林前来参加碰头会，在怀仁堂门口遇到刚从上海夺权回来的张春桥，便将了他一军，问道：陈丕显回来了吗？张春桥推脱说：群众不答应哟！谭震林紧追不放，又将一军：“群众？党组织可以做工作嘛！”张春桥老羞成怒，露出凶相：“党？党不管用了！在上海，科长以上干部统统靠边站了！”谭震林听到这话，一腔怒火由胸中升起，指着张春桥说：“原来打击一大片就是你领导的啊！”进了会议室，谭震林再次提出陈丕显以及一些大区书记、省委书记回京的问题。奸狡巨猾的张春桥又故意推脱说：“我们回去同群众商量一下”。这时，谭震林打断张春桥的话，说出了大意如“记录”的那些话。

第二大段“记录”继续引述谭震林的发言说：

捕鱼问题，连续逼我四次。说政治上造成很大影响，经济上造成很大损失。江青要把我整成反革命。就是当着我的面讲的！（谢富治插话说：江青同志和中央文革小组同志多次保谭震林同志，从来没有说过什么“反革命”。）我就是不要她保！我是为党工作，不是为她一个人工作！

这里说的捕鱼问题，是指渔船出海搞不搞“四大”的问题。谭震林同志考虑到：一条渔船上10多个人；船上有电台，民兵有武器；渔船在海上作业经常同日本、南朝鲜、台湾的渔民打交道。因此，确定出海捕鱼时不搞“四大”。这本来是作为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分管农林口的副总理谭震林的职权范围内的事，完全有权处理，这是无可非议的。陈伯达竟蛮横地加以干涉、反对，几次在电话上同谭震林争吵。

“记录”接着说：

（谭站起来，拿文件，穿衣服，要退出会场，说：）让你们这些人干吧，我不干了！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

陈毅同志说：不要走，要留在里边斗争！陈毅同志说：这些家伙上台，就是他们搞修正主义。

挨整的是我们这些人。总理不是挨整的吗？历史不是证明了到底谁是反对毛主席的吗？以后还要看，还会证明。

斯大林不是把班交给了赫鲁晓夫，（赫鲁晓夫）搞修正主义吗？

余秋里同志拍桌子发言：这样对老干部，怎么行！计委不给我道歉，我就不去检讨！

（谢富治不断插话：文化革命小组经常讲谭震林同志的好话，劝他不要这样讲法）李先念同志接着说：你不要和稀泥！现在是全国范围内的大逼供信。“联动”怎么是反动组织哩，十七、八岁的娃娃，也是反革命吗？

谭震林同志说：我们这些人说话还不如《解放军报》记者。《解放军报》记者还有人给他们说话，可是有什么人给我们说话！我从来没有哭过，现在哭过三次。哭都没有地方哭，又有秘书，又有孩子。先念同志说，我也哭过几次。

谭震林同志说，我从井冈山到现在，你们检查一下，哪里有一点反毛主席。（谢富治说：不要从个人出发，要从全局出发）我不是为自己，是为整个的老干部！是为整个党！

谈到“哭”的事，在这里介绍一下情况。由于林彪、江青一伙的干扰破坏，许多工厂停工停产，造成国家经济生活严重混乱。有一次，周恩来主持会议研究生产问题，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三位副总理到了，可是主管工业生产的国家计委副主任余秋里却被揪走了，大家焦急地等待着。周恩来和三位副总理看到国家经济命脉被破坏到如此地步，看到在革命战争和经济建设中作出过重大贡献的老干部被揪被斗，怎能不痛心疾首！周恩来情不自禁地热泪夺眶而出，三位副总理也流泪了。

第三段“记录”最后引述李先念的发言：

就是从《红旗》13期社论开始，那样大规模在群众中进行两条路线斗争，还有什么大串连，老干部统统打掉了。

谭震林说：我看10月5日的紧急指示，消极面是主要的。

这里，“记录”却没有引用周恩来接着讲的话。周恩来当时质问康生道：这篇社论，你看了吗？康生回答说：我没有看！陈伯达也装聋卖傻地说，我也没看。其实，他们都看过，而且讨论过，陈伯达还是这篇社论的签发人。周恩来气愤地说：这么大的事，为什么你不叫我们看看！10月5日紧急指示，是指1966年10月5日中央批发的《军委、总政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这个指示规定，军事院校开展“四大”，允许串连，取消院校党委对运动的领导，改由选举成立的文革小组、文革委员会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作为文革的权力机构，等等。中央认为，这个文件很重要，对于全国县以上大中学校都适用。

在怀仁堂碰头会上，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也慷慨陈词，愤怒斥责了林彪、江青一伙的罪恶行径。叶剑英说：老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对犯有错误的干部，我们党向来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哪有随便打倒的道理？照这样，人身自由都不能保证，怎么做工作？

张春桥、王力、姚文元“整理核对”的这份“记录”，是用来作为陷害几位老师和副总理的“罪状”。可是，在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看来，这不是什么“罪状”，而是一份对林彪、陈伯达、江青、康生一伙义正词严的控诉书，是一篇正气凛然的战斗檄文。字里行间，迸发着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林彪、“四人帮”的切齿痛恨，洋溢着对党和革命事业的耿耿忠心。

1968年11月21日，陈伯达和康生在同外宾会谈时，介绍了所谓“二月逆流”问题。这是到目前为止可以看到的林彪、江青一伙对这场斗争实质说得最明白的一次谈话（以下简称“谈话”）。虽然其中大多数是诬蔑不实之词，但却从反面透露出了当时几位老师和副总理同林彪、江青一伙之间的重大原则分歧。

分歧之一是搞“文化大革命”要不要坚持党的领导。“谈话”诬蔑几位老师和副总理，胡说什么：“他们惧怕革命群众，惧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们认为，群众路线就是否定党的领导。……他们叫嚣说，你们天天喊群众、群众，那还有什么党的领导？”这段谬论，一方面血口喷人地对几位老同志进行诬陷，一方面也对他们借口群众路线而否定党的领导作了“此地无银三百两”的供认。

分歧之二是搞“文化大革命”应该不应该把老干部都打倒。“谈话”说：“他们借口保护老干部，说文化大革命把老干部整得很苦，所以他们要起来保护老干部。”“他们反对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而否定二十五年前的延安整风运动。”这是强词夺理的歪曲和捏造。其实，当时争论的实质是很清楚的，这就是：承认不承认绝大多数老干部是好的和比较

好的，要不要保护老干部的大多数。在林彪、江青一伙的法西斯淫威下，大批忠于党忠于人民的好干部，被他们无辜打倒，受到了无情打击，遭到了残酷迫害，有的甚至被迫害致死。

分歧之三是搞“文化大革命”要不要保持军队的稳定。“谈话”说：“他们还有一个口号，叫做文化大革命把军队搞乱了。他们把保护军队同文化大革命对立起来。”其实，把军队的稳定同文化大革命对立起来的，正是林彪和江青一伙。他们炮制“二月逆流”冤案，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要整垮我军的一批负责同志，进一步把军队搞乱。他们借口反击“二月逆流”，把一些军队的负责同志诬指为“武老谭”，从而为冲击军事机关、搞乱军队、在军队内部打击一大片开了绿灯。

如上所说，几位老帅和副总理对“文化大革命”以来许多“左”的错误提出的意见和批评，是符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根本原则的，在内容上是正确的，而且作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表意见是完全符合组织原则的，无可非议的。这些正确意见不但没有被采纳，而且反把提意见的同志扣上“二月逆流”的反党罪名，遭到连续围攻批判，这是由于毛泽东偏听偏信了江青、张春桥一伙的汇报，支持了林彪、江青等人的结果。江青、张春桥一伙是怎样欺骗毛泽东进行汇报的呢？下面把情况介绍一下。

1967年2月11日、16日两个下午，由周恩来主持在怀仁堂召开的中央政治局碰头会，江青都称病没有参加，关锋、戚本禹因通知是谈经济问题也未到会。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出席会议，在老同志义正词严的责问下，处于被审判的地位，基本上没有发言。康生在会上为自己作了一点辩解。全场只有谢富治一人不断插话，为林彪、江青一伙多方辩解。16日下午的会刚结束，姚文元就对王力说：“这是一场大的路线斗争”。回到钓鱼台后，张春桥、王力、姚文元立即回忆整理了16日会议情况的记录。张春桥照着记录向江青汇报，又说了周恩来、康生在会上的表现。江青说：陈毅、谭震林是错误路线的代表，徐向前、叶剑英、李先念、余秋里是附和错误路线，总理在路线斗争中动摇，只有谢富治是站在正确路线一边。这是一场大的路线斗争，要马上报告主席。当晚，江青安排了张、王、姚去见毛泽东。张按照记录稿，着重点了陈毅、谭震林，又告了徐向前、叶剑英、李先念、余秋里，夸奖了谢富治。毛泽东说：要保护邓小平，谢富治是邓小平同志用的。照记录汇报完了，张还诬告了周恩来，说周恩来对《红旗》第13期社论有意见，还对《红旗》社论未送给他审查有意见，这就歪曲了周恩来的原意。周恩来是说“这么大的事（指提出批资反路线问题）为什么不叫我们看看！这就引起毛泽东的误会。他说，党章没有规定社论要常委审查。张春桥汇报完后，毛泽东沉思片刻后说：要抓军队；要抓地方；要抓干部；经济上要抓煤炭和铁路。

在毛泽东说要抓干部时，张春桥说，过去送过一个文件给主席，我们是不同意对干部一齐烧的。毛泽东说，你再送给我看看。这个文件就是李富春召集国务院八个大口负责人议论后起草的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十条部署，其中提出坚持八小时工作制、业余闹革命、规定学生不要到工厂、企业串连等。周恩来在文件上批示：“这件很好。我注了几点意见。如蒙同意，请陈伯达转报主席核阅。”那天中央文革是关锋值班，他在文件上批了我看“这个文件不一定好”，由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五人联名提了几条意见，送江青转报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同志未批，退还文革小组被压下了。这次毛泽东把此件批给周恩来，作为怀仁堂会议的材料。并把提意见的五人和江青的名字删去，改署为文革小组六同志。张春桥报送这个文件的阴谋，就是把打倒老干部的罪责转嫁到周恩来和几位副总理身上。

在毛泽东说要抓干部工作时，王力说，我和关锋合写了一篇红旗社论《必须正确地对待干部》，已送主席。毛泽东说，你回去后马上再送一份来，我要立即看。王力送去后，毛泽东当晚就将社论审阅后退还，并写信给王力、关锋，嘱他们将社论提交周恩来主持的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后发表。毛泽东在这篇社论中加了一段话：“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而又坚持不改和屡教不改的，就要允许他们改过，鼓励他们将功赎罪。”这篇社论掩盖了林彪、江青一伙打倒老干部的实质，反而在当时抓取正确的干部路线的旗帜，在实践中丝毫没有起到制止打倒一切的歪风的作用。

张春桥、王力、关锋向毛泽东汇报后，张春桥立即向江青报告谈话情况。江青要张春桥晚一天回上海，同周恩来总理谈一次话。2月17日，张春桥秉承江青的旨意同周恩来总理谈话，要周恩来总理把文革小组当书记处看待，党和国家的重大问题要先提交文革小组讨论，借口是毛泽东说过一句话：文革小组代替了书记处。这是江青一伙篡夺党和国家权力的一个严重步骤，是向主持中央政治局日常工作的周恩来夺党权。从此以后，中央发表的一切文告，采用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联合署名的方式，这是过去中央书记处主持日常工作时所没有过的。

2月18日，张春桥、姚文元返回上海。江青就约王力一起去见林彪，要王力报告怀仁堂会议和见毛主席的情况。王力按照记录稿讲了，记录稿上没有的，也按张春桥向毛泽东报告的话，讲了周恩来、康生和陈伯达。讲到陈伯达也说他没有看过《红旗》13期社论时，林彪说，陈伯达是好人，一个书生，掌握这么大的局面不容易。讲到叶剑英和徐向前对军委发出“文化大革命”的紧急通知有意见时，叶群说，他们不是都看过嘛。讲到徐向前说的“你们要不要解放军”时，林彪说，“他不能代表解放军”。讲到毛泽东讲的话时，林彪说，“照主席讲的四条办”。

#### (四)

1967年2月18日晚，毛泽东召集部分政治局委员开扩大会议，错误地非常尖锐激烈地批评了陈毅、谭震林、徐向前等老同志，指责他们是搞复辟、搞翻案，并决定这三位同志请假检讨，在怀仁堂开批评会。康生俨然以正确路线代表的姿态说，这场路线斗争胜利了，要立即准备批评材料，明天江青一起床，我就去看她，向她报告这个好消息。康生是怀仁堂围攻会（从2月25日起至3月18日止在怀仁堂召开了七次“政治生活会”）的组织者和煽动者。在怀仁堂，对陈毅、谭震林、徐向前等老同志围攻批斗了20多天，以康生、谢富治叫嚣得最凶，什么“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呀，什么“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什么“保护一小撮走资派和特务、叛徒”呀，帽子一大堆。康生还把陈毅针对林彪的话，说成是反毛主席，是否定延安整风运动；把谭震林写信斥骂江青“真比武则天还凶”，说成是从香港反共报纸上抄来的澜调，也是反毛主席；攻击徐向前不能代表解放军，谢富治还接茬造谣说“徐向前不会打仗”。这次围攻会还殃及政治局常委、主管国务院日常工作的业务组长李富春身上，几位副总理常到他那里讨论问题，康生就诬蔑他是“俱乐部主任”。李富春回答这位帽子工厂的老板：好呀，那你就组织专案审查吧！人有嘴，话总要讲嘛。这次围攻会，还迫使周恩来在最后总结发言中也作了检讨。3月18日围攻会结束，陈毅回到家里，无限感慨地对身边的同志说：真是巧合！四十一年前，1926年3月18日这天，在党和李大钊同志领导下，我们组织四千多市民，工人、学生，冲击北洋军阀段祺瑞的反动政府，革命群众遭到屠杀。鲁迅痛斥

“三一八”事件这天,是中国最黑暗的一天。想不到四十一年后的今天,我因反对这类反动家伙竟受到批判!

与围攻会相配合,在江青、康生一伙的煽动下,在社会上刮起了反击“二月逆流”的黑风,接连在街头上出现打倒国务院五个副总理(李富春、陈毅、李先念、聂荣臻、谭震林)和军委四个副主席(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用鲜血和生命保卫中央文革”的大标语,愈演愈烈。7、8月间,江青、陈伯达策划国务院各口“造反派”,组织“揪刘火线”,团团围困中南海,在外交部安营扎寨,人民大会堂开万人大会批斗陈毅,谢富治操纵大会,一心想搞臭陈毅,周恩来严厉地批评他:搞臭了陈毅同志,谁来当外交部长?你来当外交部长!农林口“造反派”在批斗谭震林时竟拳打脚踢,横加迫害,无所不用其极。

我们不妨回顾一下当时中央政治局的实际情况。“文化大革命”开始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共有23人,1966年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补选中央政治局委员6人。到1967年初春,尽管刘少奇、邓小平、陶铸被打倒,贺龙被诬陷,但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仍占大多数。除毛泽东外,经常参加政治局会议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政治局委员共13人,其中有周恩来、李富春、陈毅、李先念、谭震林、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8人;而林彪、陈伯达、康生、谢富治等人在政治局内是孤立的,这就使他们的反党活动经常受到限制和抵制,不能为所欲为。他们看到老一辈革命家不可轻侮,便处心积虑地进行迫害。

所谓“二月逆流”,便是林彪、陈伯达、江青一伙为此目的而炮制的。他们把李富春、陈毅、谭震林、李先念、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这样一些肩负党、政、军重任的老同志整垮、整倒、整臭,不让他们正常工作。其余的政治局委员,有的已受到他们排挤(如朱德、陈云),有的年老体弱(如刘伯承),不能视事。这样,毛泽东被架空了,周恩来孤掌难鸣了,这就迫使中央政治局实际上处于瘫痪状态。以后,中央文革代替了中央政治局。这样,他们就在党中央最高层公然取消了党的集体领导,明目张胆地破坏了党的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在我党历史上开创了“踢开政治局闹革命”的最恶劣的先例,进一步为在全国范围内“踢开党委闹革命”大开绿灯。这是他们篡党窃国的一个重要步骤,又为他们阴谋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扫清道路。列宁曾经指出:“党如果不捍卫自己的生存,不坚决反对那些要取消它、消灭它、否认它、背弃它的人,那它就不能生存。”<sup>⑧</sup>1967年2月前后,老一辈革命家代表广大人民群众抵制“文化大革命”,反对林彪、江青一伙取消党的领导、搞垮党的各级组织、打倒党的各级干部、搞垮党所领导的人民军队的罪恶行径,这场斗争直接关系到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一切真正的马列主义者,真正的共产党员,革命的人们,怎能不奋起同他们作坚决的斗争!

这场在中央最高层反对“文化大革命”的原则斗争,虽然由于毛泽东当时偏听偏信林彪、江青一伙的歪曲汇报,没有能够扭转“文化大革命”的方向错误。但是,不能不促使毛泽东在党的领导、稳定军队、保护老干部方面作出一些正确的决定。毛泽东提出,共产党不能不要党的领导,先在各省、市革委会里建立党的核心领导小组,规定《红旗》、《人民日报》的重大社论要先由周恩来主持的碰头会讨论决定;要重视革命干部的作用,吸收他们参加“三结合”的领导班子,不能打倒一切;将上海公社改名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强调稳定军队,拥军爱民,军委八条命令和军委十条命令要结合起来,等等。

这场抵制“文化大革命”,反对林彪、江青一伙倒行逆施、捍卫党的原则的斗争,使广大干部和群众受到了深刻教育,为他们反对林彪、江青一伙树立了光辉的范例,产生了深远

的影响。

随着斗争的发展，陈毅的遗作《梅岭三章》广泛流传，不胫而走，鼓舞广大群众与“四人帮”作坚决的斗争。

“断头今日意如何？创业艰难百战多。

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

到1976年的清明节前后，终于燃烧成熊熊的烈火，把“四人帮”及其封建法西斯统治，统统烧成灰烬。“莫道浮云终蔽日，严冬过后绽春蕾”。“四害”翦除，“严冬”已过，“浮云”驱散，大地回春，人民群众欢庆10月的历史性胜利，足以告慰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陈毅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忠魂，叫做“域中今日，忠魂与众同庆”。最后的胜利属于人民，属于真理！“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林彪、“四人帮”的复辟迷梦，已被历史的车轮碾得粉碎，那些在斗争中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老一辈革命家，犹如饱经风霜的青松，更加高洁，更加挺直，更加受到人民的爱戴、信任和尊敬。

实践证明，我们党不愧为伟大的党，我们的国家不愧为伟大的国家，我们的军队不愧为伟大的军队，我们的人民不愧为伟大的人民，搞垮我们是不容易的。经过十年动乱的锻炼和考验，我们取得了正反两方面丰富的经验教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全面地总结了这些经验教训，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大力进行拨乱反正和全面改革，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搞活的总方针、总政策，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满怀信心地指引全党和全国人民朝着建设发达、富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伟大目标胜利前进。

#### 注释：

①②《叶剑英传略》第273页，第266—267页。

③《邓小平文选》第267页。

④《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社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1967年1月1日《人民日报》。

⑤曾志：《如烟往事难忘却》，《历史在这里沉思》（3）第19页。

⑥《怀念陶铸同志》第190页。

⑦朱德：《和董必武同志七绝五首》，《朱德诗选集》第5页。

⑧《列宁选集》第2卷第459页。

